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八卷)

[明] 陈 确
(1604年 ~1677年)

实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 - 80135 - 739 - 6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8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明]陈确实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39 - 6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 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三辑·第八卷

[明]陈确实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陈确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的理学衰落与实学兴起	(1)
(一) 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	(2)
(二) 反对理学空谈心性 主张实学实行实用	(4)
(三) 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转向	(9)
(四) 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的复兴	(13)
(五)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 启导人的思想解放	(17)
人性论与教育思想	(22)
(一) “气质即义理”的性一元论	(22)
(二) “继善成性”——不断地自我修养是人性得以完成的根本途径	(24)
(三) “变化习气”与“变化气质”的对立	(25)
(四) “人欲正当处即是天理”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对立 ...	(27)
知行观与教育思想	(32)
(一) 重行尚实——《大学辨》的主题	(33)
(二) “知行合一”与读书为学	(38)
(三) “知行合一”与道德修养	(42)

下 篇

陈确教育文论选读

《文集》选读	(49)
圣人可学而至论	(49)
死节论	(50)
学者以治生为本论	(53)
雒蜀论	(54)
道俗论上	(56)
道俗论下	(58)
诸子省过录序	(59)
作八股之法	(61)
《辰夏杂言》选读	(62)
不乱说凡六条	(62)
治怒凡七条	(63)
名利凡七条	(66)
《警言》选读	(67)
警言序	(67)
近言集有小序	(68)
圣 学	(76)
知 性	(77)
性解上	(78)
性解下	(81)
气情才辨	(83)
气禀清浊说	(86)
原 教	(87)

子曰性相近也二章	(89)
性习图	(90)
性习图咏	(91)
侮圣言	(91)
无欲作圣辨	(92)
学 解	(93)
学 谱	(94)
与刘伯绳书	(95)
答朱康流书	(103)
《丛桂堂家约》选读	(107)
丛桂堂家约序	(107)
子初生	(108)
就 塾	(108)
补新妇谱	(111)
颜子好学解	(117)
学而第一疏略	(120)
怀德章疏	(121)
学易章疏	(121)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章	(121)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说	(122)
我犹未免为乡人也	(124)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125)
其为气也四节	(125)
配道义解	(126)
舜明于庶物一节	(127)
明察说	(128)
答性教问	(129)
存心章说	(129)

尽心章	(131)
大学辨	(132)
答格致诚正问	(138)
答唯问	(141)
辨迹补	(142)
翠薄山房帖	(144)
书信选读	(146)
答查石丈书	(146)
答吴仲木书	(149)
又	(150)
答沈朗思书	(151)
与刘伯绳书	(155)
与吴袞仲书	(157)
与张考夫书	(161)
答张考夫书	(164)
又	(169)
又	(175)
附: 与陈乾初书	(182)
答恽仲升书	(187)
书大学辨后	(190)
与陆丽京书	(191)
答萧山来成夫书	(191)
再与来成夫书	(193)
寄刘伯绳书	(194)
答张考夫书	(196)
又	(198)
与刘伯绳书	(200)

上 篇

陈确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的理学衰落与实学兴起

明清之际, 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撞, 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本文将从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 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 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取向、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的复兴以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启导人的思想解放几个层面对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做一全景式的描述。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 至宋代时达到了巅峰阶段。巅峰同时也就意味着衰落。

明清之际, 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 是可以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重要时代, 还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明清之际, 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 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 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明清之际的知识界、思想界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末流的猛烈抨击, 随着封建体制内部革新派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的“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 本文将从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 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 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取向以及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的复兴四个层面对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做一全景式的描述。

（一）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

谁都不能否认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有其前后的继承性,前一时代的思想不可能在后一时代突然消失,后一时代的思想也必然能够在前一时代找到它的萌芽。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思想家必须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学术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明清之际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各自在自己学术领域的侧重点不同,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实用,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黄宗羲、孙奇逢、李锜、唐甄等人基本属于陆王心学系统;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属于程朱理学系统。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摆脱“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当某一思想形态处于鼎盛巅峰期,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当某一思想形态开始走向没落走向衰退时,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修正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民族处于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某些人对传统思想形态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强烈。就是说,任何一种思想形态,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内部就已包含着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就决定了它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以程朱理学为例。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两派虽问学路径各有侧重,程朱重“格物穷理”;陆王重“发明本心”,此外两派在一系列重大理论上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

“无极”与“太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都存在较大争论与分歧，但在本质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即：“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到明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理学已沦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对宋明以来的学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这种空疏无用之风，导致了宋明时期社会的日益衰落和吏治的极端腐败。随着明后期各种矛盾的日益凸显，理学作为政治附庸的特点日益明显，其腐朽性也更加暴露无疑，给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了矫正理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自明中叶后，学者各自自立门户，学术朝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表现为王学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古学（经学）复兴运动。王阳明以继承陆九渊的思想为己任，试图取理学而代之。一时间，作为一种崛起于民间的思想形态，王学逐渐成为一种被社会上所认可的主流思想观念，而理学则被一般士人所藐视。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作为两种截然不同价值观念的递嬗来看，尽管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王学，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仍然是程朱理学。这就是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社会不同阶层所确立的不同的价值标准。上有所好，下未必一定好之；上有所恶，下未必一定恶之，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没落，无论是理学还是王学，越发展越背离初衷；越发展其弊端就越暴露无遗，完全坠入寻章摘句、支离繁琐之途。于是，明朝中后期，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产生了一股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思潮。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

《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卷58。

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明清之际已有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在明后期思想家杨慎、李贽等人开创的批判理学或心学的基础上继续对理学或心学的流弊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由萌芽、渐至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显然,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因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新的实学精神。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探究问学之列。无庸讳言,大多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恭、朱之瑜、方以智、陈确等人,是这一经世实学思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如果没有社会转轨所造成的道德失范和心灵震荡,或许这些思想家仍将徘徊在朱学或王学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但是,历史不容许假设。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的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把自己融入社会变革的浪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他们在对传统旧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引导社会走出理学的氛围,走出中世纪的门槛。可见,学术文化的发展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

(二) 反对理学空谈心性 主张实学实行实用

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心性的产物。经世思想在中国源

远流长。“经世”一词最早载之于《庄子》一书，“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有时强调治国安邦平天下；有时强调实行实用；有时强调事功趋利。一般说来，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走向：当社会处于稳定或“盛世”时期，“经世”思想表现得比较平淡；当社会处于转轨或危机时期，“经世”思想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在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各显风采，在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就是从总结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提倡的新学风，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而产生的。学风问题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一代学风的形成与转变，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经世实学派的

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不可否认,理学在初创之时,颇具有疑经、不守传注等创新精神,但其疑经往往流于主观武断;不守传注往往流于任意解经甚至改经,以至学界盛行穿凿附会、蹈空尚虚之歪风。早在明中后期,杨慎就已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之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汉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陷入“师心自用”和“一骋己见,扫灭前贤”的境地;把陆王心学斥为“学而无实”之学,走上了“渐进清谈,遂流禅学”的道路。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揭露说,那些谈论程朱理学的人,其实都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的伪君子,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败俗伤世者。这群人虽口谈“我欲厉俗而风世,”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影响,“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明末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吕坤也指出,学术要以“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为目标,吕坤称之为“有用之实学”。高攀龙也强调“学问不是空谈,而贵实行”,如果“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明亡以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更是从文化的原因来阐释社会政治问题,把宋明理学清谈空疏之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李恭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之名,俱属琐屑。”李恭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黄宗羲对明以来理

《升庵全集·文字之衰》卷52。

《升庵全集·云南乡试录》卷2。

《焚书·又与焦弱侯书》卷2。

《去伪斋集·杨晋庵文集序》。

《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冯辰等:《恕谷年谱》。

学空谈性理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以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游谈,更滋流弊。……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宋明儒者“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陆世仪把当时除六艺之外的“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看作是实用的学问。顾炎武反对“空疏之学”,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他撰著《日知录》的目的就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认为“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顾炎武把当时理学的清谈与魏晋时期做了比较,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他指责那些夸夸其谈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顾炎武看来,正是由于理学的清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是顾炎武从历史的回顾中和对理学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一种共识与历史自觉。李二曲在提出“明体适用”主张的同时,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把那些“明体而不适用”的人皆视为“腐儒”。史谓其

《清代七百名人传》(三),第1577页。

《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参见《清史稿·陆桴亭传》卷480。

《日知录》卷19。

《亭林文集·初刻日知录自序》卷2。

《国朝汉学师承记》。

《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卷7。

《清儒学案·李锜·附录》卷1。

“言言归于实践。”王夫之也主张“明体适用”，提倡“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傅山也认为，“兴利之事，须有实功。”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评价说，傅山是“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朱之瑜“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如果说顾、黄、王、唐等思想家或偏袒程朱、或偏袒陆王，对理学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明清之际另一系统的思想家颜元、潘平格、陈确、傅山等人则对于理学或心学，一齐推倒，没有丝毫保留。颜元为学最强调实学实用，他认为，自汉晋章句泛滥以来，清谈虚浮日盛，尤其是宋儒“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其为学之要旨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颜元认为，要看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他把理学家空谈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予以根本扭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学、实习、实行。梁启超说他“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潘平格斥责理学家丧失良心、学杂佛老，根本谈不上是真儒。潘平格的反理学思想，在清初颇受重视，被誉为“儒门之观音。”陈确从另一个方面把怀疑矛头指向程朱理学数百年立论的根基之一《大学》，作《大学辨》，阐明《大学》非圣经贤传，理学存在的根基被动摇，与之相呼应，傅山倡导的诸子学研究认为先有“子”，然后才有“经”，动摇了孔门独尊的地位，开创了清代诸子学研

《清史稿·儒林传》。

《霜红龕集》卷35。

《亭林文集选注·阳曲傅先生事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3页。

《存学篇》卷一。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5页。

究的新风。总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已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因此,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引发经世实学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三) 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转向

“舍经学而无理学”是与反对理学空谈性理密切相关的。因为在中国的经学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求实”的精神,而这种“求实”精神正可以用来作为批判理学空疏无用的理论武器。

经学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故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把自汉代董仲舒至晚清康有为时期的中国学术称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学时代”。千百年来,中国的学问几乎都与“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管提倡者也好,反对者也罢,他们争来论去的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经学的领域,各种学派、观点之争,如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理气、心性、道气之争等,都是由对经典的不同诠释方法引发而来。中国经学的发展形态,历来有几种不同观点,但从经学的社会功能来看,无非有三种不同表现方式:从社会政治的层面讲,经学表现为以“求用”为目的,今文经学为其代表;从历史文化的层面讲,经学表现为以“求实”为目的,古文经学为其代表;从哲学本体的层面讲,经学表现为以“闻道”为目的,宋学为其代表。今文经学治经,皆借经典之“微言”以阐发社会政治之“大义”,在今文经学看来,凡是与经邦济世无关的学问,皆为迂阔不实之学。古文经学治经,最讲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最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证的治学方法,最具西方科学的精神。宋明理学虽被后人讥为空谈性理,但他们却认为性理是最大的实际,若离开

参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5页。